

---

# 略论共产党与救国会的抗日统战主张

陈伟桐

---

在 1936 年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作用下,经历长达 9 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正式举行谈判,谋求合作抗日,开始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其中,中共与救国会的关系,对时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一 在国内革命惯势下的“抗日反蒋”方针

“抗日反蒋”曾是中国共产党使用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至 1936 年 9 月 1 日中共文件《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才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可是一些中共党史的论著竭力给人一种认识,无论“反蒋”还是“逼蒋”,在当时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笔者以为这种态度无助于对共产党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转变的真实情况的研究。为了搞清这两个口号的差别及其转变的条件,实有对“抗日反蒋”重新认识的必要。

“抗日反蒋”口号,是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会议决议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4 页。

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然而这时的国内外形势正处在急剧变化的转折点。

首先，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华北，其侵占中国本土，灭亡中国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它不仅是为了镇压与“对付中国革命的”，且将危及中华民族各阶级阶层的生存。面对当亡国奴的命运，全国各社会阶层决计抗争。就连曾替不抵抗政策及“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辩护过的胡适都认为，只有抗战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

其次，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加紧抗战准备，并着手与中共沟通。1935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了“何梅协定”，作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的退让，但又觉得再也无路可退，决计对华北五省自治进行抵制。是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作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著名讲话，第一次公开表露了最后抵抗的打算。会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清除了行政院内的亲日官僚，国人目其为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重大变动。以后，蒋又拒绝了日本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的“广田三原则”，同时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加紧进行构建国防工事等抗战准备，“攘外”开始有了具体的内容。在对待中共问题上，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军事“剿共”方针，但已开始作“政治解决”的尝试。他通过苏联驻华使馆和中国驻苏使节向苏联表示谋求国共合作的愿望，并通过几个管道与中共秘密接触。中共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发布的社论也承认：五全大会前后，国民党“亦自动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并极力放出联共的空气，在蒋介石五全大会上的演讲，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的演讲，均一字未提所谓‘剿共’，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专一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609—610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609页。

反共的蓝衣社刊物如《社会新闻》、《汗血月刊》等在这一时期中亦未登一篇反共的文字”。当然这并不表明蒋介石改变了安内攘外政策,但这毕竟是促进国共谈判的时机,因为联蒋抗日战略的基础是中日关系的全局以及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

再次,国共合作成为全国普遍的要求。1936年1月4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一文,对民众的这一要求作了明确的概括。文章说,国共合作“是国难中最迫切的需要,这是我们全国人民要求中的最主要的要求,这是我国各党派中最主要的联合,这是使我们得免于做亡国奴的一种福音,这是我们抗日救国必致易于实现的保证”。事实上,早在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前,《救国时报》就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信中建议中共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联蒋抗日方针。其理由是:“一面讨蒋,一面抗日,尤非任何军力所能做到。只抗日不讨蒋,障碍殊多,万难达到真正抗日之实现。我想讨蒋,不如联蒋。”然而当时编辑部却答复:“抗日必须讨蒋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这种认识显然是落后于民众的愿望的。

上述形势的变化,并没有使中共放弃反蒋的方针,这主要是受到当时国共对抗局面的制约和国民党剿共政策的牵制。后来中共中央领导成员王稼祥在分析国共对立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的阻碍时指出:“两个政党的政权与军队又血战了十年,残酷的杀戮与斗争使阶级斗争尖锐到极高程度。”“这些复杂条件又使统一战线合作的范围与程度时时受到限制,一方面有促成统一战线力量与趋势,另一方面又有约束、倒退、反抗统一战线的力量

---

《蒋介石竟自绝于国人》,《救国时报》1936年2月24日社论。

《救国时报》1936年1月4日。

《救国时报》1935年12月14日。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建议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109页。

与趋势。”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国民党身上，也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期策略产生影响。另外，中共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与其在长期“左”倾路线下形成的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理论思维惯势有关。受到这种理论思维惯势的驱动，这时的统一战线策略存在以下缺陷：

1. 拟通过国内革命战争完成对外民族战争的第一步，由此混淆了两种革命战争。反帝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中国的反帝民族革命，在通常情况下是与代表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的本国反动统治集团作斗争，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而不是直接与帝国主义国家作战。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时，民族革命就应是直接反对日本侵略的对外民族战争。可是无论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或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指出日本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严重事实之后，又认为：“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日本侵略势力与蒋介石国民党组成一个巨大的反革命集团，来镇压和对付中国革命。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革命是结合抗日民族战争来进行和完成国内革命。这样，侵略与被侵略的民族矛盾，又成为“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性质与目标都被弄模糊了。

2. 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互相矛盾的。为何在抗日的同时还要反蒋？根据就在于确认蒋介石是“卖国贼头子”，将其视为对外民族战争与国内革命的双重斗争对象。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东北到华北，对日步步退让，造成大片国土丧失。所以毛泽东说：“大土豪、大劣绅、大

---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建议信》，《王稼祥选集》，第112页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

军阀、大官僚、大卖办们”，“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否就是卖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注意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在安内攘外政策之下，蒋政权屡向日本妥协，确实造成了中国领土主权严重丧失的恶果；另一方面，蒋政权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并未完全放弃抗日准备。正因为如此，张学良才认为：“据我回国两年的观察，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有抗日可能。”一位自称“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员”也在《救国时报》上撰文说：“只可说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错误，决不能谓我蒋委员长已完全甘心卖国。”从实际情况看，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掌握着全国政权，统帅全国多数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反蒋怎么能同时抗日呢？“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显然是不协调的。然而当时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是卖国贼头子，因此把两个不一致的口号统一在一起了。张闻天说过：“打汉奸卖国贼的战争，即是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活的统一的联系。”因此，“抗日反蒋”实际是在抗日条件下继续国内革命的口号。

3. 将中间势力在是否反蒋问题上的动摇与是否抗日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当时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变动了“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其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

---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页。

张魁堂：《张学良在台湾》，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一个忠实国民党员的来信——关于章乃器等四先生的宣言》，《救国时报》1936年9月10日。

《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页。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

分, 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这里所说的斗争, 是“抗日反蒋”斗争; 这里所说的动摇, 是指对国共两党态度的动摇。在抗日问题上, 对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日本侵略中国的重大事件, 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明朗的, 他们积极参加救亡运动, 坚决主张抗日。而在国共两党之间, 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势力确实是动摇的。这正如刘少奇所分析的, 他们既不赞同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也不主张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将要建立的国防政府应是“各党派联合的抗日民众政权”。中共当时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是以是否拥护及有利于反蒋革命为标准的, 而不是以抗日与否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 虽然比以前前进了一大步, 但还没有彻底解决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 这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利的。

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反蒋目标, 在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策略上, 体现得尤为充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一个著名的论断是: “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 统统收集起来, 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这个“敌人营垒”中的“主要敌人”, 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蒋介石集团, 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共红军致东北军全体将士的信里, 向他们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号召他们脱离蒋介石的统制。后来中共极大地关注两广事变, 目的也是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由此可见, 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基本是服务于反蒋革命的。

---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5页。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六大以来党的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7页。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页。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抗日反蒋”的策略后来出现了变化。瓦窑堡会议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曾明确指出,“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军队”。“把卖国贼统治着的土地大块的变为苏维埃领土”。红军东征回师时颁布的“停战议和通电”,通常被认为是中共放弃抗日反蒋口号的开始。1936年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等问题致张闻天电》中,明确指出,“讨蒋”在“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但又认为,“至于将来可以而且应用国防政府发布讨蒋令,那是建筑在更多的人民与军队拥护之下必须的策略行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两广事变爆发后,中共不仅重提反蒋口号,而且把“抗日反蒋”推向高潮。

总之,“抗日反蒋”尚定位于国内革命战争。它表明,中共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转变尚未最终完成。

## 二 救国会的主张及其对中共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影响

1936年5月末6月初,以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骨干,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基础,联合全国18个省60多个救亡组织,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它的宗旨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在“横的方面,坚决的主张各党各派的合作;在纵的方面,诚意要求社会各阶层分子

---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600页。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617页。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3页。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3—94页。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的合作”。这与中共抗日反蒋的方针是不同的。

同时,救国会与中共在统一战线模式的取舍上亦有不同。30年代欧洲法西斯势力抬头,各国工人运动流行“人民阵线”的统一战线形式。这是共产党联合第二国际属下的社会民主党,反对国内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组织。后来,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肯定了“人民阵线”的组织形式。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实质,就是建立以苏维埃为“团结中心”,不包括蒋介石的“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就是采取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方式,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确立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小资产阶级,争取和分化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被称为卖国贼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它是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物,与“人民阵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与“人民阵线”(或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不同,救国会自称“救国阵线”。虽然它的宣言和纲领曾使用过“人民救国阵线”的名称,但是它所用的“人民”一词,不是阶级的概念,而是指救国阵线由非政府、非党派的民众组成,代表着民众的要求与愿望。它的目标是促成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因而它所强调的是“民族”而不是“人民”。至于“救国阵线”与“人民阵线”是否一致,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明确表示,“那是绝对不同的,人民阵线是对内的,而救国阵线是对外的”。章乃器进一步指出:“人民阵线是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人民反对国内的法西斯势力的;救国阵线是联合全民族一切力量反抗外来的侵略势力的。”为了澄清“救国阵线”与“人民阵线”的

---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救国会》,第99页。

《新形势与新政策》,《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4—475页。

《沈钧儒等案第一次审理纪录》,《救国会》,第282—283页。

《沈钧儒等案第一次审理纪录》,《救国会》,第290页。



区别,1936年7月邹韬奋在《生活日报》上,通过答读者问的形式明确指出:人民阵线这个名词,“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用“民族联合阵线”或“抗敌救国联合阵线”来得清楚。这说明了救国会拒绝了中共制订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接着,救国会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一重要文献中,明确提出了“救亡联合战线”的思想。邹韬奋把这一思想概括为:“集中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陶行知对此作了生动的说明,他说:“要减少敌人的数目,把它减之又减,减到一个大敌人;要增加我们的队伍,要加之又加,加到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变成民族解放的斗士。”这些都说明,救国会的抗日方针不仅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相对立,也与共产党结合抗日民族战争进行国内革命战争的抗日反蒋路线完全不同。

此外,救国会与中共的分歧,还突出表现在联蒋抗日与反蒋抗日的不同主张上。1936年6月两广事件发生,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南京政府抗日,并以抗日名义出师北上。蒋介石则大军压境,双方剑拔弩张,给国内局势蒙上了内战的阴影。国民党营垒的争斗,缺口大开,这给中共带来实施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良好时机,因而两广事件得到了中共的热烈赞同和积极支持。在同年5月18日、6月12日、6月20日,中共连续发布文件与宣言,肯定两广事变“进步与革命的性质”,表示愿“与西南诸领袖密切合作”,并认为“人民为着抗日有权利来推翻这样的政

---

《生活日报》,1936年7月12日。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救国会》,第118页。

韬奋:《不是创刊词》,《生活日报》,1936年8月23日。

《我对于联合阵线的认识》,《陶行知全集》第4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5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5页。

府”。但两广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先是蒋介石逼迫陈济棠下台，以后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向李、白提出政治解决的办法，逐渐平息了事变。刘少奇后来检讨中共的方针说：“在‘九·一八’后民族矛盾已经开始超过阶级矛盾，我们此时即应强调民族矛盾，但我们还是照过去一样强调阶级矛盾。”又说：“在此时，国内革命战争是要便利日本灭亡中国的。所以，此时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应当停止。此时即应反对军阀战争。但是我们在西南事变中还是采取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同情西南。”

与中共的态度相反，救国会不支持两广发动抗日反蒋。当时救国会内部在两广事件上发生了两种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单纯的军阀内战的变相，我们应该痛下攻击”；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全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我们应该跟他们去一块儿干”。但这两种极端的意见都未被救国会的领袖们采纳，他们采取了“对于西南的抗日主张表示同情，对于西南的真实内容进行调查”的作法，没去附和西南的主张，而是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两广事件发生时，邹韬奋正在香港筹办《生活日报》，他在报上“只字不提两广的反蒋运动”，而是反复宣传各党派联合抗战的主张。当时中共及各在野党派都派去了代表，可是沈钧儒和章乃器却拒绝参加两广政府。章乃器回忆道：“那时，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要组织抗日政府，派陈劭先来联系我们，要我们即到广西去，还指名要我当财政部长。当时全国的在野党派都纷纷派代表前往，只有救国会

---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4—45页。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六大以来党的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7—808页。

章乃器：《西南事件所给与我们的教训》，《救国会》，第138页。

章乃器：《西南事件所给与我们的教训》，《救国会》，第138—139页。

胡愈之：《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1986年第6辑，第16页。

紧守‘团结御侮’的主张，婉辞谢绝了。”总之，救国会关心的是“内争不容再有，御侮不能再缓”，不要“鹬蚌相争”，使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

在国内纷争的严重局面下，救国会感到抗日反蒋方针不利于民族团结抗敌，有必要批评与纠正，于是发表了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下简称《团结御侮》)。这正如沈钧儒所说：“那时两广称兵，以及红军与国军对垒，我们认为这都是消耗民族力量的内部纠纷。因为那时没有人出来说话，所以我们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说话。”《团结御侮》的中心内容是“公开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可是，这时却发生了中共代表与救国会领袖的摩擦，使该文写作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

该文的写作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当时潘汉年和胡愈之奉中央指令，对救国会进行“纠偏”，认为救国会“左”了。据胡愈之说：“潘汉年同志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同志，由我帮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这个文件经邹韬奋、陶行知签名后，由邹韬奋带到上海，让沈钧儒、章乃器签字后发表。不料遭到章乃器的拒绝，认为“初稿调子太低了，我们接受不了”，并重新起草发表了《团结御侮》一文。《八一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呼吁一切抗日反蒋势力团结起来，组织不包括蒋介石的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实现抗战。因而胡愈之依照《八一宣言》起草告全国同胞书，其

---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46页。

沙千里：《回忆救国会的七人案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第4页。

《沈钧儒等案第一次审理记录》，《救国会》，第276页。

《史良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38页。

胡愈之：《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回忆潘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38页。

配合两广事件,呼吁建立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当时在胡愈之看来,救国会不联合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有悖于中共的统战策略,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而救国会主张实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党各派的联合,自然认为抗日反蒋的调子太低了。由此可知,所谓“纠偏”和“左”,是有特定含义的,两者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救国会与中共的不同抗日主张。从后来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内容来看,救国会的主张绝非“左倾”,不是中共纠了救国会的“偏”,而是后者纠了前者的“偏”。

《团结御侮》一面要求蒋介石完全改变安内攘外的错误政策,一面希望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的主张。它列举了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和救亡组织中一些错误的表现,指出:“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集会或游行中间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还有少数青年,在抗日运动中,依然采取宗派主义的包办方式。”文章从联合抗日的立场,批评中共在《八一宣言》及瓦窑堡会议确立的以苏维埃为中心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它说:“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实行全面总动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换句话说,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如果我们相信单靠局部抗日,或者一党一派包办抗日,就可以得到最后胜利,依然不免犯了重大的错误。”对于两广事件,文章明确反对反蒋战争,指出:“西南当局应该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的态度。”因为“地方当局,在和中央政府对立的状态之下,即使出兵抗日,也未必有胜利的把握。”

---

《救国会》,第125—126页。

《救国会》,第118页。

《救国会》,第118页。

《救国会》,第123页。

《救国会》,第118页。

这样,《团结御侮》就成为抗战前一篇吁请国共合作的历史宣言书。它的发表“在国民党统治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国内各方面的重大反响”。《救国时报》的社论称赞它:“对国共合作问题更有详尽的发挥,这很明显的表现出全国舆论之所起,民意之所在,这无疑是国难危急之曙光,中华民族解放之灯塔。”《团结御侮》在7月15日发表,它对处于国内革命惯势下的中国共产党改变抗日反蒋方针有重要的影响。是年8月10日,毛泽东公开致函沈、章、陶、邹四人,表示对其主张“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愿意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改正自己的缺点,并在救国会的纲领签上共产党和红军的名字。毛泽东在信里接受救国会联合救国的主张,明确表示“现在统一战线是反对外部敌人”,“在统一战线中提出推翻某一阶级和某一政党的口号是错误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准备放下抗日反蒋的方针。

但是,毛泽东对救国会的批评也有所保留。他在信中说:“有人怀疑,现在红军的力量很难单独抗日。又有人说,抗日的先决条件,是民族统一和内部和平。还有人说,部分的抗战是有害的。但是我们不这样想。”中共方面对《团结御侮》亦有微言,《救国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沈、章、陶、邹诸先生只是偏面的希望……只向共产党红军提出不要攻击南京军,这是说得很不够的。”也有人不相信国共两党能重新合作,以为等联合以后再抗日,只是一种“幻想”。这些分歧无非集中在:国内要不要统一?和平统一是否是实

---

《救国会史略》,《救国会》,第9—10页。

《时局中心问题——国共合作》,《救国时报》,1936年8月25日。

《毛泽东同志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救国会》,第128页。

《救国会》,第135页。

《救国会》,第134页。

《救国会》,第130页。

何伟:《读了“团结御侮”之后》,《救国时报》1936年9月5日。

郁文:《对于四个救国领袖的“团结御侮”的意见》,《陶行知全集》第4集,第195页。

行抗战的前提?抵抗日本侵略的正确方针是局部抗战,还是全国抗战?然而,1936年的局势确实朝着团结御侮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同意救国会的观点,还是不同意救国会的观点,都反映了中共的策略正处在深刻变化之中,因而可以说,毛泽东给救国会四领袖的公开信,是中共转变对蒋介石国民党政策的标志之一。

在毛泽东发信后两天(8月12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确认南京当局为统一战线的主要对手,并决定请蒋抗日。8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关于联蒋抗日指示的电报,对国民党的策略“才完全转变过来”。8月25日中共致信国民党,主动建议国民党就两党合作举行正式谈判。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检讨并纠正抗日反蒋的口号。对于这个指示,张闻天解释道:“从前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的,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对南京政府的估计,说他完全是与冀察政权一样的,这也是错误的。”在两广事件上,“那种认为反蒋战争是有进步性质的说法是错误的。”因而中央对两广的方针,由支持转而“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前面袒护一方面的态度”。这样,在联蒋抗日的方针下,中共由以“三个条件”为基础的局部统一战线,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救国会《团结御侮》的发表与毛泽东的公开信,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发展过程中,由反蒋至逼蒋、联蒋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如果说张学良在“四·九谈判”中的建议促成了中共“五·五停战议和通电”,那么救国会的建议则帮助中共最终放弃抗日反蒋口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对于《团结御侮》这一重要抗战文献的产生背景及历史意义,曾作总结说:“四人署名的《团结御侮》小册子,

---

《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147页。

《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147页。

《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148页。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85页。

当时确是在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下,压榨出来的一个破天荒的号召国共两党,走上和平团结御侮大路的历史文作……八年抗日战争的获得最后胜利,是由于曲曲折折依循着这一个正确路线而获得,决不是偶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周恩来也说:“救国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有功的。”

(作者单位:中共嘉兴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荣维木)

---

《一切为了救国——忆陶行知先生》,《沈钧儒文集》,第542页。  
孙晓村:《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望》,1989年第12期。